

山西文華·著述編 閻宗臨史學論著三種

申西交通史

閻宗臨◎著

《山西文華》編纂委員會 編

山西出版傳媒集團
三晉出版社

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略述^①

任何国家的文化都不是完美的，如果没有别的国家文化来补充！文化起于需要，适应各个民族的生存，正如丹纳(H. Taine)所论，受气候、种族与时间所限制。因之，在文化起源上，虽有播化论与创化论的争辩，但我们则同意发明与传播各半的主张。法国汉学家，有主张中国文化发源于埃及或巴比伦，他们的推论，有时颇近乎形而上学。我们知道中国以破布制纸，埃及用制纸草制纸，墨西哥又用别种原料制纸，难道中国与墨西哥同受埃及的影响吗？

概括地说，在秦汉以前，中国文化是独立的；在晋隋以后，佛教输入，形成李唐的文物及宋元明的理学。蒙古崛起，驰骋欧亚，虽开东西交通坦路，但在文化上无特殊成就，只留下马可·波罗富有刺激性的见闻记而已。土耳其兴起，阻塞中亚路线，为夺取东方香料，发现若望神长，以收拾十字军残局，发现新航路，这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史实。中西文化在印度洋也便正式接触了。

万历九年(1581年)，利玛窦来华，西方文化随公教输入，所不幸者，西方谋利者，挟其优越武器，未给中国留下良好印象，而中国卫道心切，只认西方文化是术而不是学，西人只知利而不知义，于是

^①原载《建设研究》第6卷第2期，1941年。

中西文化起了剧烈的冲突。这种矛盾，鸦片战争时始被击破。自此而后，中国备尝各种苦痛与侮辱，拱手接受西方文化，却也养成了民族意识。

多少人讥笑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说法！但这是必走之路，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是独立的民族。我们并非说要复古，亦非说轻视科学，更非说西方文化统于六艺，我们只说：每个民族有他自己生理与心理的要求，中国的社会基调与欧洲不同，体用的说法虽旧，却应有新的解释。

二

有些中西交通史的学者们，主张中国文化是来自西方的，他们的证据是以星纪日与以事纪年，而在我国古代典籍内，也有些类似的记述，并且提到西方。如《穆天子传》周穆王西至昆仑，见西王母；在古本《竹书纪年》，也提到西王母来朝。《穆天子传》系根据《竹书纪年》，《竹书纪年》不十分可靠，加以想象作用，遂说穆王至波斯，西王母即波斯女王。顾实《读穆传十论》中，指出古代中西交通的孔道：“大抵穆王自宗周灋水以西首途，逾今河南、直隶、山西，出雁门关，由归化城西，绕道河套北岸，而西南至甘肃，入青海，登昆仑，复下昆仑而走于阗，升帕米尔大山，至兴都库士山，再折而北，东还至喀什噶尔河，循叶尔羌河，至群玉之山，再西逾帕米尔，经达尔瓦兹(Darvarz)、撒马尔干(Samarkand)、布哈尔(Boukhara)，然后入西王母之邦，即今波斯之第希兰(Teheran)也。又自今阿拉拉特(Ararat)山，逾第弗利斯(Tifris)之库拉(Kura)河，走高加索山之达利厄耳(Dariel)峡道，北入欧洲大平原，盖在波兰华沙(Warsaw)附近，休居三月，大猎而还，经今俄国莫斯科北之拉独加(Ladoga)湖，再东南傍窝尔加(Volga)河，逾乌拉尔(Ural)山之南端，通过里海北之干燥地，及今阿拉尔海(Aral sea)中，循吹(Chu)南岸，至伊锡克库尔(Issikkul)湖南，

升廓克沙勒山，而走乌什、阿克苏、焉耆，再由哈密，长驱千里，还归河套北，逾阴山山脉而南，经乌拉特旗、归化城，走朔平府右玉县，而南逾洪涛山，入雁门关之旁道，南升井陘山之东部，通过翟道太行山而还归宗周。”假使穆王西行为真，用何种交通工具，为何西去，既去之后，何以后继无人？最使人费解的，穆王十三年闰二月初十日天子北征，绝漳水；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天子入于南郑，为时仅十九月，尚有三月行猎、王母的应酬，如何能行如此长的距离，这实使人费解！

《逸周书·王会解》中提及来朝各国间，有渠搜、月氏、大夏等西方古国，这些地方，除大夏见诸《管子》外，余皆汉以后西域国名。即《管子》中之大夏，据向达言亦为汉人所加。如无地下精确证据，只靠这些恍惚的记载，我们无法确定这种“惊人的奇迹”。

言中国文化西来者，取以星纪日，即日月水火木金土，巴比伦称之为七星，亦即《尧典》中：“在璇玑玉衡，以齐七政。”《玉海·天文书》中：“七政布位，日月时之正，五星时之纪。日月有薄食，五星有错聚，七者得失，在人君之政，故谓之政。”以七日为时间单位，最早见于《创世纪》：“上帝造物，七日齐毕。”七日为周，不见于殷商，因殷商以旬纪时故，如《周易》中丰卦之初九：“遇其配主，虽旬，无咎，往有尚。”但是，继在震六二爻辞：“震来厉，亿丧贝，跻于九陵，勿逐七日得。”又在复卦辞：“复，亨，出入无疾，朋来无咎，反复其道，七日来复，利有攸往。”于是，遂认周文化来自西方。冯承钧序沙畹《摩尼教流行中国考》中说：“……考新旧唐书经籍志艺文志，北齐陈隋之间，已有七曜历（至易卦‘七日来复’，别为一事，不可混解）。似今日星期输入之时，应在隋唐以前。”

其次，取以事纪年，佐证中国文化之西来，丁山考宗周鼎彝刻辞，认为以事纪年的证例，如鬲卣铭：佳明保殷成周年；中斋铭：佳王令南宫伐反虎方年。这种记事方式，即认为受巴比伦的影响。在公元前 2474 至前 2358 年间，有名王比生（Bur-Sim），在位九年，第一年

平乌比洛姆(Urbillum)城,因称元年为“平乌比洛姆”年;第五年平沙姆(Sham),遂名为“平沙姆”年。但只据这种近似事实,便断言中国文化来自西方,未免过分轻率,标特立异。马林诺夫斯基(Malinowski)说:“考古学和历史,供给我们许多凭据,表明器具、艺术或社会制度,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区域内单独发展的。”

三

西方古代典籍中,也有简略的东西交通事迹,据克岱西亚(Ctesias)的波斯(Persica)书记载,在公元前 545 至前 539 年之间,波斯大帝西流士(Cyrus)向东方进兵,大夏(Bactriane)便是第一个牺牲者。大夏失陷后,康居粟特(Sogdiane)随即臣属,妫水(Amou Daria)一带,包括 Margiane 与 Ouvarazmiya,悉为波斯所有,建工事,筑西洛波利(Cyropolis)城。向北进,为俄国荒原所阻,转向东走,至新疆附近。当时波斯军遇沙加(Caka)抵抗,骁勇好战,屡胜西流士。不幸沙加王阿莫若(Amorges)被俘虏,一时失掉重心;其妻斯巴拉脱拉(Sparethra)出,善战,败西流士,波斯释阿莫若王。据希罗多德(Herodote)记载,沙加为波斯属地。

其次,在公元前 330 至前 328 年间,亚历山大步西流士后尘,向东进发,由俾路支、阿富汗一直至土耳其斯坦,即至古时大夏。沿途建立许多城市,其间最著名者为:麦西德(Mesched)、犍陀罗(Kandahar)、加布(Kabaul)、撒马尔干、高任德(Khojend),留一支军队,驻守于此,至公元 7 世纪,犹保存着希腊文明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中说:“大月氏西君大夏,而塞王南君罽宾”,罽宾即 Gasmir,塞即希腊人,其时匈奴冒顿迫月氏,月氏臣大夏,复迫塞王至北印。

四

西方史籍中之记载,只可视为中西交通之接近,而真正为中西交通辟一新纪元者,为张骞出使西域,见诸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。公元前 165 年(汉文帝十五年),大月氏居甘肃西北,为匈奴所败,避居

伊犁河流域；继又为乌孙所逐，迁居妫水。公元前138年时，武帝欲利用他反匈奴的心绪，与之联络，夹击匈奴。张骞应募，出使月氏。当张骞过匈奴时，被拘十年，“与妻，有子”，继始脱亡，经大宛(Ferghana)、康居，最后到妫水北之大月氏。时大月氏王为胡所杀，其子立，无心报仇，张骞无结果而返，在归途中复为匈奴所执，居年余，匈奴有内乱，乘机逃归。

张骞在外交上虽说失败，但是这种冒险的精神，足以表彰民族的伟大。“初骞行时，百余人，去十三岁，唯二人得还”。后人虽以“空见葡萄入汉家”讥之，但他带回许多经济与地理知识，给中国巨大的影响。

自张骞此行后，中国据有西域较正确的知识，始知游牧民族之后，尚有许多富丽城郭，文物昌隆，宜于通商，即亚历山大当年所遗者，经年累月，形成伊兰希腊文化。为此，张骞主张有二道可通西域：其一即张骞往返所经者，可是北有突厥，南有藏种，时时加以断绝。汉武帝为控制通道计，占领今之凉州、甘州、肃州、敦煌等地。其二为假想之路，因骞在月氏时，见有邛竹杖与蜀布，询问来历，始知来自身毒(Sindh)，身毒位于南，张骞遂判定由西南亦可至西域。从此后，中国政府向西南发展，即受此种力量推动，不知中印之间，隔有崇山峻岭，用那交通工具，很难达到身毒，可是，开发江南的功绩，实一重要史实。但是，对黄河发源的观念，张骞以为来自塔里木河，系和阗与疏勒之混合，流入蒲昌海(Lob Noor)，复潜入地下，至积石山而出。这是完全错误的，可是这种说法却非常流行，一直至公元822年(长庆二年)，唐使刘元鼎至吐蕃后，始略知黄河发源真相，校正前说。

四

张骞死后，汉使数至西域各地：安息(波斯)、奄蔡(介乎里海与

咸海间)、黎轩(亦作黎軒,即 Alexandria)、条枝(叙利亚),当时中西交通之繁,以大宛为最,《汉书·西域传》说:“大宛国……北与康居,南与大月氏接。”徐松补注说:“三国境相接。”汉《西域图考》载之更详:“由疏勒而西,出葱岭为大宛月氏,大宛在北,今霍罕国八城皆其地。”

公元前 102 年(太初三年),汉与大宛国交破裂,取大宛都城贵山王城,在今之 Uratepe。大宛献马求和,因饲马故,输入苜蓿,并移植蒲桃(《史记》作蒲陶),蒲陶系希腊文 Botrus 之译音,汉镜以蒲桃为图案,亦足看出受希腊文化的影响。大抵在武帝时,俄属土耳其斯坦、里海、黑海、古波斯、叙利亚等地,中国对之有明确知识,敦煌便成了中西交通的孔道。

王莽乱后,中国无力西顾,匈奴复起而作乱,暴敛横征,西域诸国不堪其扰,山车王贤出,戡定西域,贤死,西域又乱。明帝时,中原少定,移力绥靖西域,在公元 73 年(永平十六年),班超出使西域,兼用武力与外交,创一新局面。“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,其条支、安息诸国,至于海滨四万里外,皆重译贡献。”班超为西域都护。

当班超在西域时,闻黎轩即大秦国,仰慕大秦的富庶与文物,公元 97 年(永元九年),遣甘英至条支,渡海访大秦。条支为安息属国,安息垄断中国丝织贸易,不愿中国与大秦发生直接关系,因而安息船家向甘英说:“海水广大,往来者逢善风,三月乃得渡;若遇迟风,亦有二岁者。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,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,数有死亡者。”甘英惧,不敢前进。所至之海,即波斯海湾,由此沿阿拉伯半岛入红海。班超居西域 31 年,返至洛阳时已 71 岁了。

费诺莎(Fenollsa)论秦汉美术与西方关系时,亦提到安息阻碍中西交通,他说:“中国与罗马之直接通商,大为安息人所忌,不愿为介,故美索不达米亚所有之亚述、巴比伦及波斯之美术,以及流行于罗马帝国内之希腊美术,对中国影响并不深刻。”

远在秦汉以前,中国的丝已传到西方,亚历山大部将着丝绸衣,

大家不明白何以这种衣料没有褶纹。希腊、罗马的作家,如索利纳(Solinus)、沙耐克(Seneca)、奥赫斯(Horatio)等都以诗歌咏,而当时的贵妇们,争相竞取,以着丝为光荣。罗郎(Lauranb)研究罗马服装时说:“是在奥古斯都时代,由中国输入丝绸。”

因为丝绸大宗输入希腊,将原有对中国的称呼 Sinae 抛弃,而代以 Seres。Seres 有二意:一指蚕吐之丝,一指产丝之地,继后拉丁人也是这样习用的。拉丁的文人,如味吉尔(Virgilius)、薄利纳(Pline)以为丝是一种植物,由森林中树叶所造成的。因之,西方对中国名称,亦无确定,到中世纪,弃 Seres、Thina(由秦得声)而用 Cathay,习而久之,西方人视中国(China)与契丹(Cathay)为截然不同之两地,引起许多误会。迨至 1595 年(万历二十三年),利玛窦游南京后,始确定契丹即中国,他写道:“我的假设证实了,波罗说到南京后,须经一道江,此江即中国人所称之为扬子江也;波罗又说江南有八国,江北有七国,非他,此即中国之十五省也。自我的观察言,契丹即中国,大可汗即中国之皇帝。”

因为交通不便,关山万里,辗转相传之知识,自然起许多附会,中国史籍中之大秦亦是其一。当张骞与班超使西域后,始知乌弋山离即大秦,所以称为大秦之故,有种种不同的解释,据藤田丰八:“汉时称美索不达米亚、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间之沃地为 Daksina,传入中土,以地代名,遂称大秦。”据德礼贤(d'Elia)解释:“……在公元 2 世纪时,中国称作秦,西利亚和东罗马称作大秦,因为西利亚和东罗马人比中国人长大,《后汉书》上也提及大秦或西利亚人说:‘其人民皆长大平正,有类中国,故谓大秦。’”两说都能言之成理。

大秦一名,见诸中国典籍最早者为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传》:“永宁元年(120 年),掸国王雍由调,复遣使者,诣阙朝贺,献乐及幻人,能变化,吐火,自支解,易牛马头,又善跳丸,数乃至千,自言我海西人,海西即大秦也,掸国西南通大秦。”

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:“至桓帝延熹九年,大秦王安敦遣使,自日南

徼外，献象牙、犀角、玳瑁，始乃一通焉，其所表贡，并无珍异，疑传者过焉。”延熹九年为公元 166 年，当时哲人 Marcus Aurellus Antonius (121—180) 为罗马皇帝。继遣部将 Avidius Cassius 征安息，破其都城 (165 年)。《梁书·诸夷列传》中《天竺传》说：“黄武五年，有大秦贾人字秦论，来到交趾，交趾太守吴邈，遣送诣权。权问方土谣俗，论具以事对，时诸葛恪讨丹阳，获黝歙短人，论见之曰：大秦希见此人。权以男女各十人，差吏会稽刘咸送论，咸于道物故，论乃径还本国。”黄武五年为公元 226 年。至晋太康五年，罗马皇帝 Carus 遣使来中国，取安息都城，旋即死。西人研此罗马使者，臆断为商人，冯承钧在《大秦考》内说：“顾桓帝之时与汉武帝隋炀之时不同，无所用其招徕外国粉饰升平之举也，予以为其使确为安敦及 Cassus (此为 Carus 之误) 之使。”可是中西交通正式确立起来了。

五

元鼎六年(公元前 111 年)，中国势力渐及南方，征服南越国，即今之广东、广西与北圻，置南海、苍梧与合浦等郡，受张骞假想途路的推动，中国与南方逐渐发生关系，这在中西交通史上是很可注意的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说：“自合浦徐闻(海康)，南入海得大州，东西南北方千里，武帝元封元年，略以为儋耳珠厓郡……自日南、障塞、徐闻、合浦船行可五月，有都元国；又船行可四月，有邑卢没国；又船行可二十余日，有谶离国；步行可十余日，有夫甘都卢国；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，有黄支国……平帝元始中，王莽辅政，欲耀威德，厚遗黄支王，令遣使献生犀牛。自黄支船行可八月至皮宗，船行可二月，至日南象林界云。”这些地方，只确知黄支是印度东岸之 Kanchipura，即玄奘所记的建志补罗国。

三国时(245 年)，吴大帝遣康泰、朱应使扶南国，沿澜沧江而下，康、朱著有游记，惜皆佚，可是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，录有朱应所

撰《扶南异物志》。其间最可注意者，在汉使未至扶南之前，扶南王遣使去天竺，谒茂轮王(Mouroundas)，都于曲女城(Kanyakoubdja)，中印交通，又多一路。

这种简略的记载，在沟通文化方面看，自亦简略。在公元初，大月氏越妫水至印度河流域，建贵霜帝国，笃信佛教。在公元前2年，贵霜王遣使至中国，口授佛经。《三国志·西戎传》中说：“汉哀帝元寿元年，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。”继后明帝做金人梦，佛教更为盛行。当时除宗教外，普通生活亦受影响，如汉时女子耳环，有玻璃质者，系罗马产物；汉魏间之海马葡萄镜，亦系受希腊图案之影响。中国丝物之西传，固不待言；斯坦因(Stein)在和阗发掘之木简，亦足证明中国文化之西传。

假使我们相信费诺莎的话，中国雕刻最受西方的影响。他论孝堂山祠及武氏祠说：“论年代与质朴，当推孝堂山祠，系公元后百年内之遗物，此种人马及驾车之模型，皆以线刻之，实中国人类生活最古遗于今日者。观多数马之驰骋，由横面视之，恰如原始埃及画之图案，数马相重。且其马非缩首短足之鞑靼马，实血气充满之骏马，分外生动，头足高扬，矫然长跃，呈优美曲线之和谐，或鞍上有人，动作亦极良佳，盖取西方亚细亚壁画之方法与题材也。”这种说法，我们不敢视为定论，但中西艺术的接触，则是不能否认的。中村不折在《中国绘画史》中说：“始皇二年，骞霄国的画人烈裔入朝，口含丹墨，喷壁成龙……又善画鸾凤，有轩轩然唯恐飞去的样子。盖骞霄国是西域的一国，其技术非常进步，由是中国的绘画便开始接触外来的形式，传其技工……”

六

秦汉以后，中西交通频繁，其与中国文化关系，影响至巨，特别是西方宗教之输入。

建元八年(372年),秦王苻坚遣使送浮屠及佛像顺道经于高丽,其时佛教自犍陀罗传于东土耳其斯坦,经唐古时人之介绍,传至中国西北部,继后又东至高丽。中国僧人以不屈不挠的精神,西行取经,经六百年的时间,构成中西交通史上最重要之史实。

隆安三年(399年),中国僧人首先赴天竺求戒律者为法显。自长安出发,经兰州、凉州、甘州、肃州、敦煌等地,至鄯善国;继西行,至犍犍(焉耆),入于阗。于阗信佛,法显感其壮丽。法显由此出发,经子合国(Karghalik)、于魔国(Tach Kourghan),至竭义国(疏勒)。由此越葱岭,过新头河(印度河),至迦湿弥罗(Cachemir)与乌苾国(Oudiyana)。从此经犍陀罗国,观礼四大塔,又南行至弗楼沙国(即今之Peshabar),见迦腻色迦王所建之窣堵波。继至那竭国(Nagara-hara),拜佛之遗物,法显便在巴连弗邑(Patalipoutra)居三年,学戒律,东还时,顺恒河而下,至多摩梨帝国(Tamralipti),为当时Bengale大海港,继至狮子国(Ceylan)礼佛齿,住二年,乘舟至耶婆提国(Java Dvipa),又至广州。时风波大作,至长广郡界牢山(山东即墨附近),计十五年,著有《佛国记》,为世界重要之典籍。

天监十七年(518年),东胡建魏国于北部,胡太后命宋云与沙门惠生出使西域礼佛,各著有游记,今佚不传,其梗概见杨衒之所著《洛阳伽蓝记》。是书所记,多不详明,独于乌苾国及乾陀罗国多纪实,可看出贵霜王朝时代。

隋炀帝受裴矩《西域图记》影响,亦欲开发西域,遣使至罽宾、王舍城与史国(Kesch)。《隋书》说:“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,司隶从事杜行满,使于西蕃诸国,至罽宾得玛瑙杯,王舍城得佛经,史国得十舞女、狮子皮、火鼠毛而还。”

递及唐朝,佛教更为发达,其原因颇为复杂。在政治上,此前君主们极力提倡,梁武帝“日只一食,膳无鲜腴,惟豆美粝而已”,后赵石勒崇信佛图澄,后秦姚兴崇信鸠摩罗什,都予以有力的推动;在社会方面,十六国南北朝演变之后,不久便是天宝安史之乱,正如王昶

司寇所说：“……民生其间，荡析离居，迄无宁宇，几有尚寐无讹，不如无生之叹。而释氏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，上升兜天宫之说诱之，故愚夫愚妇，相率船象，百余年来，浸成风俗。”不只人民的生活需要这种新的寄托，便是那些知识阶级，亦需要一种新的解放，张融死时，左手持《孝经》，右手执《莲华经》。智颢创天台宗，杜顺创华严宗，玄奘创法相宗，并非标奇立异，实是当时精神生活的需要。所以中外僧侣，络绎不绝于途。自西方来的高僧中，有佛图澄、鸠摩罗什、达摩、善无畏三藏、金刚智三藏、不空三藏；中国西去受戒求经者，有法显、宝云、昙摩竭、惠生、义智三藏，其间最著名而关系中国文化最要者为玄奘。

玄奘于贞观三年(629年)首途，经凉州、瓜州至伊吾，承高昌国之召，入其国，并至西突厥统叶护可汗。继循天山南路，过阿耆尼(Karacher)、屈支(库车 Koutcha)、跋禄迦(Yaka Aryk)，越天山，过清池(Issykkohl)，至素叶城(Tokmak)，晋謁叶护可汗，礼遇甚优，旋至康居，逾铁门，渡缚刍河(Oxus)，经犍陀罗而至印度。

玄奘游南印度还，居那烂陀寺(Nalanda)者二年，继应迦摩缕波国(Kamaroupa)国王鸠摩罗(Koumara)之请，至其国；而摩揭陀国(Magadhn)戒日王(Harsha Ciladitya)欲见脂那僧，坚请前来，召开大会于曲女城。继后玄奘归时，渡信渡河，遇风波，微损所载经典与花种，越大云山(兴都库什山)，至于阆，修表入朝，请恕十五年前私往天竺之罪，使还报。贞观十九年，玄奘凯旋入长安，佛教从此有坚固的基础，而中国文化，虽有韩愈的拒佛，却不能阻止激起一种质的变化。《法苑珠林》载有王玄策出使事，正史中未曾提及，在天宝间(751年)悟空西去，初未出家，中途因病设愿，病愈落发为僧，但从未出玄奘右者。

七

西方宗教中祆教传入中国,为期亦早。《魏书·波斯国传》:“波斯国……俗事火神天神……神龟(魏孝明帝)中,其国遣使上书贡物云。”唯在当时,以缺乏西方历史与语言知识之故,中国学者将祆教(Mazdeisme)与摩尼教(Manichéisme)混而为一,不相分辨。宋志磐《佛祖统纪》:“初波斯国之稣鲁支,立未尼火祆教。”

火祆教的创立者为曹赫斯特(Zoroastre)。这位波斯的哲人,相传出自皇家,约公元前660年生于墨地(Medie),为人谨思慎守,喜思维,一日出化,得天书名“成德瓦斯达”(Zeud-Vesta)。由是建立宇宙二元论,善恶永远在斗争中,善神为阿莫池(Ormuzol),按照石刻说:“他是万物的生命,天地人的创造者。”恶神名阿利曼(Ahriman),象征残缺,黑暗便是他的说明。善神的代表是火焰,因为火焰含有一种神秘,特别是光明的象征。人死后三日,须受阿莫池的裁判,行为性灵纯洁者与之交友,恶浊者落秦瓦(Chinval)桥下,永无光明的一日。

萨珊(Sassanides)王朝时,定火祆教为国教,因政治与交通关系,祆教遍传西域,如康居、高昌、焉耆、疏勒、于阗等地,相继建立祆祠。南北朝时,东西交通频繁,祆教亦随入中土。《魏书·宣武灵太后传》中:“后幸嵩高山……从者数百人,升于顶中,废诸淫祀,而胡天神不在其列。”陈垣先生对天神解之曰:“天神以其拜天也,其实非拜天,不过拜日月星辰耳。日月星辰丽于天,拜日月星辰无异拜天,故从中国名谓之拜天,又因其拜火,又谓之天神火神。”

继北齐北周之后,中土仍祀天神,《隋书·礼仪志》内载:“……后主末年,祭非其鬼,至于躬自鼓舞,以事胡天,邺中遂多淫祀,兹风至今不绝。”唐承周隋,祆教传播愈广,敕建祆寺,置萨宝府(萨宝译自回鹘文 Sartpau,义为商旅队首领,见向达先生所著《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》),设祆正、祆祝,胡人充之,掌其祭。其时祆教非常发达,贞观

五年(631年),波斯人何禄来长安从事传教,按宋敏求《长安志》,火袄祠在长安一城者,有四处:布政坊西南隅、醴泉坊西北隅、普宁坊西北隅、靖恭坊街西。按《两京新记》,袄祠在洛阳者,至少亦有四处:会节坊、立德坊、南市、西坊。从袄寺在两京设立数目上,亦可见唐时袄教的隆盛。

继后,武宗时,西域平定,逐渐压迫外来的宗教,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中说:“武宗即位,废浮屠法,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,大秦,穆护,袄二千余人。”《唐书·百官志》中也说:“祠部……两京及碛西诸州火袄,岁再祀,而禁民祈祭。”

八

景教为聂斯多(Nestorius)所创,聂氏生于叙利亚之日尔曼尼西(Germanicie),元嘉五年(428年),聂氏为君士坦丁主教,时东罗马受希腊影响,多作抽象神学的讨论。聂氏主张耶稣有两身,圣母为纯人性的,因而否定耶稣的超人性。在431年,爱弗斯(Ephese)宗教会议定聂氏理论为异端。聂氏道不行,出走利比亚,在440年间,死于荒原内,而他所创的理论,风行中亚细亚一带。

天启五年(1625年)乙丑,西安西郊土中,发现建中二年(781年)建立的石碑,上刻中文与叙利亚文,词句富丽雄壮,字体端庄健老,碑顶刻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”。这一文献,引起中西学者多少讨论。

贞观九年(635年),叙利亚人阿罗本(Alopen)来华传教,太宗命房玄龄出郊迎宾,度僧二十一人,建寺庙。寺在义宁坊,原名波斯寺。《长安志》说:“义宁坊(原注:本名熙光坊,义宁元年改),街东之北波斯胡寺(原注: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胡僧阿罗斯立)。”“斯”显为“本”之误。

阿罗本受封为护国大法主,景教日见昌隆,“法流十道,国富元

休，寺满百城，家殷景福”。当时名相郭汾阳亦与景教僧伊斯友善。李白的《上云乐》，如中村久四郎，亦认为是景教作品。“碧玉灵灵双目瞳，黄金拳拳两鬓红。华盖垂下睫，嵩岳临上唇”。这完全形容西方人的面貌，鼻高有如嵩岳。“能胡歌，献汉酒，跪双膝，并两肘，散花指天举素手”。这是形容景教的祷祝。景教碑为大秦寺僧景净(Adam)所述，系主教，文字必出华人之手。至于景教名称之由来，正如钱念劬在《归潜记》中所述：“入中国后，不能不定一名称，而西文原音弗谐于口，乃取新约光照之义，命名曰景，景又训大，与喀朵利克(Catholique)原义亦合，可谓善于定名。”

自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出，清儒给予许多考证，冯承钧先生有专篇记载，如王昶的《金石萃篇》，毕沅的《关中金石记》，钱大昕的《潜研堂金石文跋》，杭世骏的《古道堂文集》，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，徐继畲的《瀛环志略》等。西儒介绍景教碑者，亦复不少，最早的著述，有葡人阳玛诺(Emmanuel Diaz)的《唐景教碑颂正诂》；最完备者，当推夏鸣雷(Havret)的《西安府景教碑考》。总前贤所著，最精而最博者，当以钱念劬的《归潜记》。

当景教碑传至欧洲时，欧洲学者如伏尔泰等怀疑它的真实性，现因敦煌发现经典中，有许多中文译本，景教及景教碑的真实性完全不可撼摇了。

德礼贤在《中国天主教传教史》中，言及西方景教传教士来华，所带经典有 530 部，而译为汉文者，有 35 部。最早的译经，要算《移鼠迷诗河经》，讲耶稣一生事迹，颇为详尽。大约是贞观九年至十二年间之译品。其次是贞观十六年所译《一神论》，是一本神学书，述及娑殚、复活、永生等理论。此外尚有《三威蒙度赞》、《宣天至本经》、《志玄安乐经》。最后两部经典，为大秦寺僧景净所译，约在 8 世纪末叶。当时景教势力颇大，成都也有景教寺院。

会昌五年(845 年)，武宗受赵归真推动，大兴教难，景教与祆教等遭受同样命运，势力日渐衰下去了。宣宗即位后(847 年)，闰三月

下诏：“敕会昌季年并省寺宇，虽云异方之教，无损致理之源。中国之人，久行其道，厘革过当，事体未弘，其灵山胜境，天下州府，应会昌五年所废寺宇，有宿旧名僧，复能修创，一任住持，所司不能禁止。”这虽是弛禁，可是不久便有黄巢之乱(878年)，景教当然亦受到摧残，因为过百年后(980年)，景教主教遣人向欧洲报告说：“中国景教，如今始毁灭了，本国奉教者，先后消灭，教堂已拆毁，中国境内只剩了一个景教信友。”所以德礼贤说：“这样看来，中国景教，第一次完全毁灭，谅必是在将近纪元后 1000 年的时候。”

九

摩尼教为摩尼(Mani)所建立。摩尼生于埃克巴坦(Ecbatane)的贵族，其父便是一位宗教家。摩尼受了环境的影响，潜思与推进他的理论。在沙朴一世(Sapor I)，公元 242 年(正始三年)时，摩尼开始传教，自言所宣扬的理论，并无特殊创见，仅综合前圣所言，如摩西、曹赫斯特、释迦、耶稣，加以一种补充，使宇宙间有真正的光明。他又主张人生是一种斗争，是善与恶的斗争，正如光明与黑暗似的。他这种理论，不只风行中亚，而且传到印度与中国。

关于摩尼教，中国最初的记载，是玄奘的《西域记》。在叙述没刺斯国时，他说：“天祠甚多，提那跋外道之徒为所宗也。”提那跋，据沙畹解释，便是摩尼教的 Denavari。

宋僧人志磐所著之《佛祖统纪》，曾提及摩尼教入华史实：“近载元年(694年)，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。”沙畹考定志磐记述，录自宗鉴重修的《释门正统》；根据敦煌的文献，拂多诞非人名，乃一种称号，系古波斯语“Fur-sta-dan”的译音，意即“知教义者”。

《册府元龟》卷九七一记：“开元七年(719年)六月，大食国、吐火罗国(Tokharistan)、康国、南天竺国，遣使朝贡，其吐火罗国支汗

那 (Jaghāniyān) 王帝賒, 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阁, 其人智慧幽深, 问无不知, 伏乞天恩唤取慕阁, 亲问臣等事意, 及诸教法, 知其人有如此多艺能, 望请令其供奉, 并置一法堂, 依本教供养。”慕阁, 古波斯语为 Muze, 作师解。

摩尼教入华后, 未能即刻盛行。慕阁居华十三年, 便有敕令禁教。杜佑《通典》说: “开元二十年 (732 年) 七月敕, 末摩尼法, 本是邪见, 妄称佛教, 诳惑黎元, 宜严加禁断, 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, 当身自行, 不须科罪者。”这时只禁中国人, 胡人仍可信教自由。

摩尼教来华, 输入七曜, 北天竺沙门不空弟子杨景风, 著有《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》, 说: “夫七曜者, 所为日月五星下直人间, 一日一易, 七日周而复始, 其所用各各于事有宜者, 有不宜者, 请细详用之。忽不记得, 但当问胡及波斯并五天竺人总知, 尼乾子, 末摩尼以蜜日持斋, 亦事此日为大日, 此等事持不妄, 故今列诸国人呼七曜如后。”据沙畹解, 胡即康居; 尼乾子梵文为 Nirgranthaputra, 汉言外道。蜜日持斋, 即日曜日, 蜜有时作密, 康居语为 Mir。

代宗时, 回纥强, 摩尼教利用政治力量, 向中土发展。《唐会要》说: “大历三年 (768 年) 六月二十九日敕赐回鹘摩尼为之置寺, 赐额为大云光明。六年正月, 敕赐荆、洪、越等州, 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。”迨至武宗初, 回鹘势衰, 波及宗教, 刘沔偕沙陀吐浑之兵, 破回鹘。《唐会要》说: “会昌三年敕, 摩尼寺庄宅钱物, 并委功德使及御史台, 京兆府差官检点, 在京外宅修功德回纥, 并勒冠带, 摩尼寺, 委中书门下条疏奏闻。”

《新唐书》中所提更为具体: “诏回鹘营功德使, 在二京者悉冠带之。有司收摩尼书若象, 烧于道, 产货入之官。”此后摩尼教存于中国者乃变质华化之摩尼教。